



魯迅——偉大的思想家 與偉大的革命家

徐懋庸作

中南人民出版社

魯迅——偉大的思想家
與偉大的革命家

中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中)0640

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

作 者： 徐 懇 廉

出 版 者： 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合 營 新 新 印 刷 廠
(漢口前進一路49號)

1—10,000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甲1)2,700元

前記

近幾年來，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觀點，研究魯迅，隨時有一點心得，寫了幾篇文章。現在把這些文章編成一個小冊子，並根據毛主席的結論題名為『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這是因為，我在這些文章裏，只論到魯迅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方面，而還沒有涉及他的文學家的方面。

此外，我把一九四一年為晉冀魯豫邊區的『新華日報』所寫的『我所受於魯迅的影響』一文和三年前所作『魯迅論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筆記，作為附錄，也編在一起。正當毛主席號召各種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時候，我想，把魯迅關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正確、深刻而又有形象性的意見，集中起一部份（我所摘記的是不完全的），供知識分子參考，應該是會有好處的。

徐懋庸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目 錄

中國人民的勝利也就是魯迅精神的勝利	(一)
魯迅的革命道路	(三)
魯迅關於革命的戰略策略的思想	(四)
毛澤東思想與魯迅思想.....(二)	
附錄	
我所受於魯迅的影響	(三)
蕭軍的伎倆	(三)
魯迅論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四)

中國人民的勝利 也就是魯迅精神的勝利

魯迅先生去世已經十三年了。這十三年，在每一個艱苦奮鬥的戰士和忍辱受難的人們的感覺中，曾經是很長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又覺很短。你看，僅僅十三年的時間，中華人民已經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美國帝國主義，打倒了蔣介石國民黨，結束了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創造了新的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

十三年中，實現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革，這是多麼快呀！這十三年是顯得多麼短呀！中國人民在這十三年中所贏得的偉大勝利，是有魯迅先生的偉大的教導和鼓勵的作用在內的，而且，今天，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國人民的作爲，恰好完全符合於魯迅先生的多年的願望。

魯迅先生早就反對中國歷史上人民『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希望中國人民『創造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現在這第三樣時代，已經實現了。這就是人民民主的時代。

魯迅先生早就憤恨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在中國所排的人肉的筵宴，而希望中

國人民『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今天，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國人民，已經基本上掃蕩了這些食人者，掀掉了這筵席，毀壞了這廚房，只有一些殘餘，也快將被肅清了。

魯迅先生向來反對遇見凶獸時現出羊樣，遇見羊時現出凶獸樣的卑怯行爲，而主張『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這也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意思。中國人民現在所實現而且堅持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正是魯迅先生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魯迅先生是一貫擁護蘇聯的，他曾經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癱瘓，是它們的寶貝，那末，它們的敵人（指蘇聯）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今天中國人民根據毛主席的『一邊倒』的原則所實行的團結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友人的政策，是與魯迅先生的立場完全一致的。

總而言之，魯迅先生死後十三年的事變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也證明了魯迅思想的正確。這十三年來中國人民所贏得的偉大的勝利，也就是魯迅精神的勝利。在革命不斷勝利的進程中，日益顯出了魯迅先生的偉大。

我以為，有志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青年，也還須好好學習魯迅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

魯迅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同志說過：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新民主主義論』）。「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同上）。魯迅一生的文化革命的工作，未嘗片刻與包括政治與經濟的整個革命運動的總路線脫節，他只是在整個革命運動中站在文化工作的崗位而為整個革命運動服務罷了。因此，魯迅也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者，而且如毛澤東同志所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他不同於某些脫離整個革命運動的路線而僅僅在文化方面中起過一些革命作用的人們。

對於魯迅，必須首先從革命家這一面開始，才能真正瞭解他的其餘的一切。魯迅自己論到古今中外的文化人的時候，也極重視這一點。例如他的敬重章太炎『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却因為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且介亭雜文二集』中『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百餘年來的中國革命，總的說來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的這種革命，但辛亥革命，乃是舊民主主義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變成了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

主義革命。魯迅的革命思想，也是隨着中國革命的這種變化而發展的，他由一個舊民主主義者變成爲共產主義者，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積極參加了各個階段的具體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

辛亥革命以前，青年的魯迅，就痛感到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之禍國殃民，並且痛感到在滿清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中國前途的危險，因此就立志革命，首先想以科學來啓發民智，後來則想以文藝來改變國民的精神。所以在這一時期，他介紹了許多科學知識以及歐洲的許多富於反抗精神的文藝作品，同時對於辛亥革命的政治運動，他也積極擁護。他贊頌章太炎，鄒容，徐錫麟……等促進辛亥革命的戰士，且與他們有實際的聯繫。他在一九〇八年參加過『光復會』這個革命團體。對於領導辛亥革命而後來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孫中山，魯迅尤其敬佩，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的紀念文中說：

『中山先生一生的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忽然武昌起義，接着是紹興光復』，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成立了；魯迅曾經熱心參加民國政府的工作。但不久他就看出了辛亥革命的真實結果，『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范愛農』），依舊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依舊是封建統治

者向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屈膝，這曾使他一度失望；但他並未絕望於將來。從一九一七年開始，仍然繼續努力，根據科學精神，大聲吶喊；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切病態，一加以揭露與抨擊，寫了很多論文雜感，並開始創作新體小說。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這是一個『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在文化方面則是澈底的反封建文化的運動。『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新民主主義論』）而魯迅在這個文化革命運動中則是一國急先鋒。

在五四運動以前，發生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這使中國革命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使舊民主主義革命改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變化，也影響了魯迅，他自己說過：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以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而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一九三四年『答國際文學社問』）

由此可見，魯迅在五四運動的積極性，已是初步受到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的鼓

舞的。

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與參加者不久就起了分裂：『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自選集自序』）『高陞』的是當時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五四運動的右翼，他們大部份後來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去了。『前進』的部份則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

魯迅是前進的，被十月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所鼓舞的他，更猛烈地向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宣戰，這時他的主要的具體鬥爭對象，則是那些受過歐美教育以『正人君子』、『新時代的青年導師』自居，而實際為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幫兇的新式紳士，如章士釗、陳西瀠之流。他因此受到種種迫害，被解職，被列入黑名單。但仍鬥爭不屈。北伐戰爭發生以後，他是積極擁護的，所以在一九二六年秋，他離開北京，往革命的南方——廈門和廣州去了。

在這個時期，魯迅就看出反革命對於革命的危害，對於人民的危害，因而主張對反革命不能姑息，譬如對於咬人的狗，雖然是已經落水的，也還得打擊它。他說：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細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他指出

辛亥革命後，革命者姑息了反革命，所以反革命「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然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所以，他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一九二五年『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這就是說，應該堅決鎮壓反革命。

對於十月革命，魯迅雖曾有過『冷淡』和『懷疑』的一個時候，但從未有過反對的態度。而且自一九二六年起，他開始介紹起蘇俄的文藝理論與文藝作品來；如任國禎譯的『蘇俄文藝論戰』，就是經魯迅幫助出版的，魯迅又為勃洛克的詩『十二個』作後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為『爭自由的波浪』所作的小引中，魯迅說：

『俄國大革命之後，我就看見些游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抬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為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頭。』

又如，一九二七年六月，在香港青年會講演『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到蘇聯革命以後，暫時還沒有文學上的大作品：

『但是，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

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這時，魯迅已經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具有堅強的信心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轉到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中國革命就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了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動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期有兩種反動圍剿：軍事圍剿與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與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與全世界的反動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與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從蔣介石反動派看來，似乎以為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却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軍事圍剿的結果，是紅軍的北上抗日。文化圍剿的結果，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促成了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而其消極的結果，則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全國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而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却正在這「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新民主主義論』）

這一時期中魯迅的革命工作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針對着蔣介石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反蘇的罪惡政策，魯迅明確而堅決

地信仰共產主義，捍衛人民，擁護蘇聯。尤其是一九三〇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以後，他就公開表示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立場了。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他的演說中，他反對不與實際社會鬥爭接觸的空談的社會主義，反對那種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幻想，反對無產階級作家把自己看得高於工農一等。他主張『無產文學應該是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一翼。』

一九三一年，他在『二心集』的序文中說他自己：『原先是憎惡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消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他對共產黨在九一八以後所提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堅決擁護：『中國目前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的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是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認爲是非常正確的。』（一九三六年『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關於青年學生和工農大衆受蔣介石反動派的屠殺和壓迫，魯迅曾經寫了很多的文章，加以揭露，且向世界控訴。一九三〇年，他加入了捍衛人民自由的『自由大同盟』。一九三三年又加入了『民權保障同盟會』。

關於蘇聯，他在一九三二年的『我們再不受騙了』一文中寫道：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不好，它們愈急於進攻，因爲它們愈要趨於滅亡……』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末，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

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並且從一九二七年開始，魯迅就一直大量翻譯或介紹蘇聯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如『藝術論』、『毀滅』、『鐵流』等……）同時還介紹蘇聯的版畫。

一九三六年托洛斯基派陳獨秀寫信給魯迅，誣蔑斯大林是官僚，毛澤東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是出賣革命。魯迅給以嚴正的駁斥，指出托派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第二、這一時期魯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所謂『民族文學』（其實是賣國賊的文學），對於梁實秋等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文學理論，對於以『第三種人』自命，而其實是反革命的幫兇者，進行了勇敢堅決的鬥爭。自一九二七年的『而已集』，特別是一九三二年編的『二心集』以後的論文雜感，大部是對着這些鬥爭對象而發的砲彈和匕首。例如九一八事變後，南北學生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抗日，遭國民黨政府虐殺；事後國民黨政府反而通電全國，誣學生們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並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其妙，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魯迅對此嚴厲斥責道：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佔了遼吉，砲轟機關，他們不驚訝。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訝。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祕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訝。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訝了！

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甚麼東西……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訝，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掉東三省，黨國倒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一九三一年『友邦驚訝論』）

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一文中，集中地分析了上述各式人等的反動本質。他把這一時期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方面，借了愛倫堡的話，規定爲『一方面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は荒淫與無恥。』（『八月的鄉村序』）

第三、這一時期，魯迅既然參加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陣營，因此他的鬥爭，也就比過去多了一個方面，即在革命陣營內部反對不正確傾向的鬥爭。這裏我只舉出兩件較大的事情來說。第一件事情是一九二八年魯迅與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這一次論爭，在魯迅的方面，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界的左傾盲動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一年）中說：『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是未經好好的計

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的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再則他們……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叫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一九三〇年左聯成立大會上他的演說，是關於這一論爭的內容的系統而正確的總結。第二件事情是一九三六年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徐懋庸的批評，這一回，在魯迅方面，是反對他以為在左聯內部存在的投降主義（他懷疑徐懋庸等一部份同志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某些工作，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和宗派主義。他說：『在左聯結成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是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喳喳，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傳流不絕。』這是關於當時『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的基本原因，以及當時左聯內部徐懋庸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鬧無原則糾紛的本質的最恰當的分析。在這給徐懋庸的信中，關於當時革命文藝界內部許多爭論作了系統而正確的總結。在這兩次的問題中，雖然魯迅在某些具體人事的情況的估計上，有偏差和誤會，（那是由於不自由的地下生活的限制所致，他所指出的宗派主義是嚴重的，但投降主義是不存在的。）然而他的政治上的原則性，理論上的正確性，則是永遠顛撲不破的。